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22

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 审视与建构

禹旭才,熊耀林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全媒体语境下话语传播呈现出主体的权威性与草根性共生、内容的系统化与碎片化并存、方式的融合性与裂变性同行等特点,这些特点将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这主要表现为:异质话语的强势渗透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舆论事件的庞杂叙事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网络乱象的监管缺位分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需要严把价值导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思想基础;做强主流舆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宣传版图;推动技术赋能,净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全媒体语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建构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172-06

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重要,具有根本性、战略性与全局性意义。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①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从本体维度来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与内核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其量之多寡、质之高低直接关乎政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与长治久安,直接影响着举旗帜、聚民心等重要使命任务的达成。“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②,这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媒介传播的新语境,延伸了话语主体的物理身体,丰富了话语资源,拓展了对话空间,创新了对话方式,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和巩固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同时,伴随而来的草根化的公共参与、海量化的信息数据、碎片化

的信息传播、泛娱乐化的话语表达、圈层化的网络交往、无序化的网络赋权等,也无时无刻不在消解客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正确体认,导致意识形态的混淆与价值体系的解构,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因此,探析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境遇,有效利用全媒体舆论生态唱响意识形态主旋律,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确保中国梦早日实现的重要课题。

一 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境遇

全媒体是“一种新的、开放的、不断兼容并蓄的媒介传播形态和运营模式”^③,它使话语传播在实践层面上出现了主体复杂化、议题丰富化、形式多样化的泛化转向,在客观上为话语传播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新场域。因此,客观分析

收稿日期:2020-12-25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17JDSZK023);湖南省党建理论基地专项资助课题(19DJYJY04);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湘教通[2019]291号)

作者简介:禹旭才(1967—),女,湖南邵东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②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③王庚年:《全媒体技术发展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与正确把握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面临的新特点与新问题,是有效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逻辑起点与现实依据。

(一) 话语传播主体的权威性与草根性共生

全媒体语境下,话语传播主体空前复杂,既有官方媒体、商业化媒体、民间团体,也有专家学者与普通个体,呈现出权威性与草根性共生的格局。话语传播主体的权威性表现为其对话语的主导力、解释力与论证力等方面,如官方媒体或精英阶层在面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时,通过规范性的解读凝聚共识、统领人心,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培育健康向上的主流文化。但话语传播主体如果过于权威,难以关照不同客体的利益诉求,难以与客体达成心理上的共鸣,易出现“曲高和寡”的困境。话语传播主体的草根性表现为话语的平权化、碎片化与个性化等方面,草根阶层中人人都是麦克风,任何个体或组织都可以成为“话语中心”和“传播基站”,使得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场”变成了全员涌入的“舆论广场”。尼葛洛庞帝就曾形象地指出:“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①全员媒体有利于开展分众化和差异化传播,但因每个个体的思想观念与利益诉求不同,易解构信息生产与意识形态传播一致同构的运作结构,造成话语中心的弥散化,在一定程度上将稀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与权威性。

(二) 话语传播内容的系统化与碎片化并存

全媒体语境下,话语传播内容呈现出系统化与碎片化的双重特征。系统化主要体现在资源聚合上。首先,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始终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展开,系统阐释其精神实质、丰富内涵、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形成具有价值统摄的“叙事框架”、概念体系及语言形式,增强话语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统领和整合能力,从而促进话语受众夯实理论基础、筑牢思想根基。其次,面对舆论事件,官方媒体与各大民间媒体都是集中式地关注、传播,从事件的开端到最终的结果都予以跟进报道,形成了针对这一事件的话语集聚。碎片化则主要体现在自媒体组成的民间舆论场中。匿名化、低门槛的网络信息发布机制使得微博、微信、

论坛、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的话语传播具有非权威性、非制度化、零散化的特征。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追求“短平快”,打破了传播内容系统化的局面,迎合了受众“快餐式”汲取信息的需求,践行着一种渗透式、弥散化、隐蔽化的“微观意识形态”叙事,肢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模式,易造成断章取义的“裁剪式”阅读和只言片语的“拼接式”理解。列宁曾严肃地指出:“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②碎片化传播将使受众难以知晓事实的全貌,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效力大打折扣。

(三) 话语传播方式的融合性与裂变性同行

全媒体语境下,话语传播的渠道、方法与手段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话语传播方式呈现出融合性与裂变性同行的特点。融合性主要表现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发挥集成联动作用,催化融合质变,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发挥话语传播的一体化效能。但目前媒体话语融合尚存短板,更多还是“物理捆绑”,尚未产生“化学反应”,亟需深度融合。裂变性主要表现在话语传播呈“链式反应”,任何一条信息资讯都能依托全媒体在多个层级间呈几何指数扩散开来,如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能在几个小时内形成爆发式传播。这种裂变式的传播格局具有以往其他媒介难以比拟的扩散优势和传播效能,但因传播主体的匿名性和传播环境的虚拟性等特征,这种裂变式传播方式极易成为虚假信息丛生、冗余信息泛滥的温床,导致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和传播的离散化、去中心化。

二 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的表征

全媒体语境下,异质话语的强势渗透、舆论事件的庞杂叙事以及网络乱象的监管缺位等,使非主流意识形态随时可能登堂入室,这在本质上是各种话语力量的动态博弈,是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与意识形态主体利益的较量。如果在思想上不引

^①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起高度重视,在监管上不采取有效措施,将势必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传播力与公信力。

(一) 异质话语的强势渗透弱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

巴赫金认为:“所有异质语都是各自具有目的、意义和价值观念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特定的观点,是用词语将外部世界概念化的形式和特定的世界观。”^①全媒体传播链在给主流话语传播提供更强动力的同时,异质话语也随之进行强势渗透,使得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对抗更加激烈,主流话语权与非主流话语权的争夺更为复杂。一是外源型异质话语的强势渗透。“全媒体时代的基础是数字化的网络,西方借助自身经济和科技优势,将表征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西方词汇和西方术语向外输出,形成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挤压着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不断使之失语或边缘化。”^②当前,国际传播秩序仍呈现“西强东弱”的格局,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与“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通过网络社区、搜索引擎、个人主页与热门话题贴竞相发声,“在这些社会思潮‘充满激情的话语旋风’的表象背后,均隐含着操纵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渗透,都包含有一套蛊惑人心观念系统和价值传播系统”^③。还有一些国家和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操控国际舆论恶意歪曲事实、诟病中国、唱衰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意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阻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二是内源型不良言论的交织传播。网络的隐匿性、开放性和随意性等特点,成为不良言论滋生的温床。国内个别群体的思维和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罔顾中国的具体实际,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如“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来评价中国的发展实践,质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社会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有些个人故意渲染“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等错误论调。这些异质话语已经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杂音和噪音,不同程度地挤占、遮蔽、诋毁主流话语,意

图消解人们的共同信念和社会凝聚力,淡化或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正如习近平在“5.17讲话”中所说的:“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④

(二) 舆论事件的庞杂叙事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

由于全媒体融合带来的媒介生态变化,新的舆论场域聚拢了不同的叙事主体,形成了不同的焦点议题,导致叙事内容的庞杂化,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叙事主体的复杂化。全媒体语境下,叙事主体可分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主流媒体因长期以来给受众留下了刻板生硬的符号性印象,使受众对其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感。而自媒体形象化、微观化、娱乐化的叙事方式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成为了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集散地”,极度分散了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抢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当舆论事件发生后,自媒体往往蜂拥而上,在没有经过严格的编制和真伪鉴别下进行信息传播,可能导致虚假信息的广泛蔓延。即便主流媒体通过调查事情真相,出现舆情反转,也使一些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了质疑。二是叙事内容的庞杂化。叙事内容的选择影响着舆论的导向。自媒体为了彰显其新、短、快的优势,在题材选取上更倾向于生活化的微观叙事,并通过微信、微博、贴吧等自媒体平台实现无缝分享与转载功能,这分散了话语客体对宏观叙事的关注,对主流价值的深刻思考。而且叙事主体转发的内容可能是初始文本,也可能是二度拼贴与诠释的信息,因此,对同一事件出现了冗杂的叙事版本,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同时,自媒体空间中议题的发起通常受商业驱动、利益诉求与情感宣泄等多重因素影响,对相关事实常常予以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解读,这种非理性的话语表达致使相关事实变得纷繁复杂,易导致群体偏见,不利于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

(三) 网络乱象的监管缺位分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

公信力是产生影响力的关键性、战略性资源,

① Bakhtin M.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p.291-292.

② 李兴选:《全媒体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理论导刊》2015年第2期。

③ 秦程节,何小春:《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话语权建设》,《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没有公信力,传播就毫无效果可言^①。公信力的构成要素包括导向正确、观点严谨、明辨是非、格调高雅、情感亲和等。在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公信力被消解的根源在于互联网商业媒体与主流媒体内在运行的逻辑相悖离,信息选择的多样性与意识形态引导的方向统一性之间存在矛盾,致使网络表达乱象丛生,在“黑色地带”充斥着大量争议性内容、虚假信息以及负面信息,这些不良信息加大了传播的监管难度,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公信力。一是道德失范现象普遍存在。当前,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为了追逐资本,以暴力、色情等低俗方式进行炒作,不顾价值尺度,违反道德准则,降低网民的思想道德水准。还有一些网络平台的“弹幕”中充斥着污秽、下流、诅咒的话语,形成了一种庸俗化、恶俗化的语言氛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负面影响。也有一些个体在利益的驱使下,戴上不同的“ID面具”,毫无底线地编造谣言、虚构煽情元素来捏造事实和博取眼球,这种失德、失信行为的泛滥使诚信受到质疑,易产生“塔西佗陷阱”效应,激发怀疑主义或逆反性舆论认知,直接影响了媒体整体的形象与公信力。二是娱乐至上的倾向不断泛化。娱乐文化在全媒体语境下泛滥成灾,精准的AI算法极易使网络受众沉沦在娱乐信息的茧房里,变得思维麻木、自我迷失,出现信仰危机和精神困境,弱化成为娱乐的奴仆,从而产生“不求意义,但求娱乐”的价值取向。这些受众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宏观题材漠不关心,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的新闻提不起阅读兴趣,被庸俗的“娱乐至死”精神所麻痹。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②可见,这种娱乐至上的倾向,极大地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三 全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全媒体语境改变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媒

介生态结构。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必须主动把握全媒体发展大势,在严把价值导向、做强主流舆论与推动技术赋能三个维度上精准发力,实现信息内容、平台终端与技术应用共融互通,最终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回归与超越。

(一) 严把价值导向,夯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思想基础

流传于全媒体语境中的许多信息或内容,都潜藏着某种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具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塑造能力。意识形态话语权从价值层面来看,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内蕴的核心价值所具有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体现为根本利益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遵循^③。因此,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必须重视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性、革命性、彻底性建设”^④,使话语的供给力与解释力全面升级,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效果。一是要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思想内核上下功夫。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根”与“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增强说服力与解释力,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经典理论“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以强大的现实说服力去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环;必须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回应时代主题,立足社会现实问题,用党的创新理论抢占全媒体语境的制高点,用具有严密话语逻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铸魂育人,从而引导话语客体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同时,还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意蕴去充实主流话语的文化底蕴,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在张力作用,用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去提升中国话语的说服力。二是要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思想交锋中求突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

^①喻国明:《媒体融合中的话语方式转型》,《人民日报》2014年7月31日。

^②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③田旭明:《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论析》,《理论探讨》2019年第4期。

^④张国启,汪丹丹:《论新时代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维度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0页。

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①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显著增强,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多样多变。一方面,要在思想激荡中立主导,增强国际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要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既要打造出国际一流媒体,主动发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从而扭转信息进出的“逆差”、传播实力的“落差”与主观印象的“偏差”,又要有理有力有节开展舆论斗争,组织力量批驳恶意言论、澄清错误偏见,确保“斗争‘斗’到点子上、‘争’在关键处”,遏制攻击渗透行为。另一方面,要在思想碰撞中谋共识,增强国内凝聚力。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与价值取向,扛起传播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变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代责任,通过设置价值话语、传播价值理念、开展价值观的较量交锋来增进社会价值共识、引领社会价值导向,建立起全民集体认同的价值体系,促进全体人民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从而更好汇聚起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伟力。

(二) 做强主流舆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宣传版图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②全媒体语境下,巩固和抢占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成功的关键。主流媒体肩负着“党和人民喉舌”的政治责任,承担着引导正确舆论的社会责任,是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最重要的主体,需坚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不断增强影响力与竞争力,构建好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打造出具有强大社会效应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一是要协同联动话语主体,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力。主流意识形态的高效传播离不开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话语同盟,政府要通过人才引进、教育培训、政策支持等举措,培养一批讲政治、守纪律,有凝聚力、战斗力,关键时刻能够靠得住、冲得上、打得赢,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全媒型、专家型人才队伍^③,既要培

养他们上接“天线”的理论素养,也要培养他们下接“地气”的人文情怀,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中坚力量。同时,要发挥好广大党员、专家学者、正能量意见领袖的协同联动作用,在理论宣传、社会科学、新闻舆论与文学艺术等方面全面宣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力、认可度和实效性。二是要双向建构话语内容,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召力。优质的话语内容是舆论场上的“硬通货”,要实现好正能量与大流量的有机结合。当前主流宣传话语还存在单向布道式传播问题,不利于提升话语的传播质量,必须推动话语核心内容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建构。既要用心用情做有品质、有格调的内容,及时有效传达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道德体系,又要在人民性、实践性与生活性上下功夫,以浓郁的人文精神积极关注话语客体的分众化、差异化特点,瞄准话语客体心里所想、情感所需、利益所求,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匹配用户偏好,从而实现信息的精准化与定制化传播。三是要改革创新话语方式,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吸引力。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趋势日趋明显,全媒体语境下的话语表达方式也应推陈出新。主流媒体要在筑牢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阵地的基础上,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构建好报、刊、网、端、微、屏等多种载体的媒体方阵,实现话语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构建具有强大引领力的话语场域。同时,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不同群体的个性需要和接受习惯进行精准分析,推出多种形式的配图文本、解说视频、动漫图表、多媒体数据库等,通过多样化、可视化的表达,使受众看得懂、记得住、传得开,切实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使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三) 推动技术赋能,净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生态环境

面对失范甚至泛滥的信息潮,必须推动技术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②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③俞宙,李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问题及建设路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赋能,将网络技术与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进行深度耦合,筑起技术防患的大堤,这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路径。马克思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①。因此,要不断探索智能化技术创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信息锚定等技术优势进行数据洞察,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网络主控权。一是要加强话语的预警分析,抵御垃圾信息的潜在侵蚀。充分运用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自动筛选话语海量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类聚类整理,进而研判群体的思想动态与行为特点,以监测出敏感议题和热点问题,从源头上筛选和阻截不良信息,化解潜在的危机。同时,要运用关键核心技术严加监管网络“黑色地带”的负面话语,可以通过防毒杀毒软件、防火墙软件、IP 过滤软件、区别提供服务等技术手段及时采取打击、分

化、瓦解“黑色”地盘、限制“黑色”影响。二是要加强话语的情感分析,监测舆情的情感流动。全媒体生态下,话语传播呈现出“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特点,必须高度关注话语表达中的情感流动倾向。话语情感内核的流动过程主要表现在:个体接收到特定的话语信息,会将其与自身的经验结构进行匹配,从而形成对相关信息的情感态度,并情绪化地加工原有素材,呈现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这种个体情绪化的表达容易随着交互行为的不断聚合,扩散至网络圈层,进而带来系列次生危害。近十年来,将深度学习这种强大的机器学习技术应用于情感分析变得非常流行^②。将文档向量(Doc2Vec)方法与降噪自编码器(Denoising Auto Encoder, DAE)的预训练模型等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意识形态话语治理领域,能全面把握舆情事件中的情感内核与社会情感的流动,提高情感分析的准确度和实用性,有效解决情感动员与价值引领的难题。

Review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Omni-media

YU Xu-cai & XIONG Yao-l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omni-media, the discourse power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s confronted with the reality that the authority of the discourse subject is symbiotic with the grassroots,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discourse content coexist, and the fus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discourse transmission mode coexist, which, to some extent, have eliminated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ts dissolution is characterized as follows: the strong infiltration of heterogeneous discourse weakens the dominant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The mass narration of public opinion events weakens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The lack of regulation of Internet chaos weakens the credibil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guid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transmission and consolidat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transmissio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expand the propaganda field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urif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the context of omni-media;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instream ideology; deconstruct; construct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

^②李国,高敬文:《论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治理的数据驱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